

# 撤县设区是否提高了 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评价

梁志艳 赵 勇

**摘 要** 调整行政区划是地方政府降低城市行政成本和促进城镇化的常见做法，但此举是否有利于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则有待实证检验。作者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对2000—2004年各地区实施的撤县设区准自然实验的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撤县设区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城市基础教育服务水平，但是对医疗服务水平的影响则不明确。隐含的政策含义是，应发挥行政区划调整在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中的积极作用，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理顺城市管理体制，确保建立公共服务水平的财政投入长效机制。

**关键词** 撤县设区 公共服务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中图分类号】F2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51X(2019)01-0049-11

## 一、引言

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因素对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Henderson et al.，2005；魏后凯，2014；赵勇、魏后凯，2015）。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许多地方政府试图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理顺城市行政管理体制，降低行政成本，扩大城市规模，增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从经济政策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层面也格外强调行政区划调整在突破城镇化体制机制障碍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推进城镇化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批准号：14ZDA026）；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陕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政策效应评价”（批准号：12JZ051）。

【作者简介】梁志艳（1993-），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邮政编码：710127；赵勇（198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邮政编码：100010。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出,要选择不同区域不同城市,开展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设区模式分类试点。

尽管行政区划调整在促进城镇化发展、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中的积极作用不断被强调,并在一些地区开展了试点工作,但目前其效应仍然缺乏科学的评价以及广泛的经验证据支持(叶林、杨宇泽,2017)。同时,已有研究以省直管县的政策效应评价为主,对撤县设区的政策效应评价相对较少,而且对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评价主要采取案例分析和定性研究,缺乏客观的定量分析。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调整行政区划过程中存在“唯GDP主义”,忽视了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形成了“重发展、轻民生”的恶性循环局面(赵聚军,2012)。因此,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撤县设区政策改革是否能够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已经成为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亟须回答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DID)来评价行政区划调整(撤县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实施撤县设区政策改革,有利于提高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但对医疗服务水平的影响则不明确。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政策效应评估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估计方法,第四部分是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实证检验结果,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 二、文献综述

行政区划调整是理顺城市行政管理体制、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城镇化和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出于研究主题的考虑,本部分重点就有关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政策效应评估进行回顾。

### (一) 省直管县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

针对省直管县政策改革影响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政策效应评估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省直管县政策改革有利于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王德祥和李建军(2008)针对湖北省的数据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政策改革的实施有利于简化政府行政层级,降低财政资金等资源在各级行政层级之间流转的损耗率,从而促进了县、市两级公共物品供给的改善;刘佳等(2012)以河北省136个县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省直管县实施后对县域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认为省直管县有利于提高县域城市生产性公共服务水平,但对服务性公共服务水平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谭之博等(2015)使用倍差法分析省直管县改革对财政分权和民生的影响,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县中学在校生比重,增加社会福利院床位数,且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具有长期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省直管县政策改革并没有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Wang 等 (2011) 基于河南省的分析表明, 省直管县实施后, 县级政府领导层获得了更多财政资源支配自主权, 政绩晋升等原因激发了其努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但与此同时, 对加快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则重视程度不足, 拥有越高财政自主权的县公共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越低; 宁静等 (2015) 基于全国县级数据, 使用 PSM-DID 方法验证了省直管县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 认为省直管县并不利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 且这种遏制效应呈现空间上的异质性和时间上的动态差异。

第三种观点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政策效应取决于县与市之间的相对经济实力大小。刘叔申和吕凯波 (2012) 对江苏省省直管县改革的研究发现, 省直管县改革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效应, 取决于县与市之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大小, 即在“强市-强县”和“弱市-弱县”条件下省直管县有利于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水平提升, 但在“强市-弱县”情形下省直管县对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作用则不显著。

## (二) 撤县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机制

少数学者研究了撤县设区政策改革影响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深层机制。柳拯等 (2017) 对重庆市实施撤县设区政策改革的研究发现, 城市在实施撤县设区后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服务标准提高、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增强以及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三方面; 何韵文和郭符林 (2017) 认为撤县设区政策改革的实施有利于增加大城市的基础教育投资份额, 且城市中发生多次撤并政策对基础教育的改善作用优于只发生一次撤并政策对公共服务的政策效应; 卢盛峰和陈思霞 (2016) 进一步揭示了撤县设区政策改革有利于促进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深层机制, 指出地方城市在实施撤县设区政策改革后, 人为降低了县级政府领导层的自主决策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性, 使其由经济发展资源政策的制定者转变为执行者, 从而开始更多地关注于城市公共服务。

已有文献就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 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已有研究以省直管县对公共服务的政策效应评价为主, 而就撤县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政策效应评价相对较少; 二是现有关于撤县设区改革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政策效应评估以案例分析和定性研究为主, 难以提供坚实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基础。因此, 本文试图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客观评价撤县设区改革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

# 三、估计方法、变量与数据来源

## (一) 估计方法

本文实证研究中主要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这一方法可以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减少双重差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方法应用中存在的样本

选择偏误问题。DID 方法要求将全样本数据分为处理组 (Treatment Group) 和控制组 (Control Group) 两个子样本, 即将在研究期间实施撤并政策改革的样本作为处理组, 而将一直没有实施过政策改革的样本作为控制组。由于撤县设区政策改革的实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每个城市实施撤并政策的时间都不相同, 因此本文借鉴唐为和王媛 (2015) 的做法, 将 2000—2004 年发生撤县设区政策改革的地级市划分为处理组, 而将 1995—2012 年没有发生撤县设区的地级市视为控制组。若撤县设区在各地级市中是随机实施的, 则实施撤并政策前后两组样本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就是撤并政策对其的无偏估计量, 上述过程可用式 (1) 表示为:

$$ATE = E(\Delta) = E(Y_1 | X, Merger = 1) - E(Y_0 | X, Merger = 0) \quad (1)$$

其中,  $Y_1$  表示实施撤县设区地级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分值,  $Y_0$  则表示未实施撤县设区地级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分值。式 (1) 得到的结果即为撤县设区改革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基于上述思想, 本文的主要实证模型为式 (2):

$$Y_{it} = \alpha + \beta_1 t_{it} + \beta_2 Merger_{it} + \beta_3 t_{it} \times Merger_{it} + \et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Y$  表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t$  表示撤县设区实施的时间, 将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期间定义为 1, 其余时间为 0;  $Merger$  为是否实施撤县设区的虚拟变量,  $Merger = 1$  代表处理组,  $Merger = 0$  则为控制组;  $X$  为相关控制变量,  $\varepsilon$  为误差项。可以看出,  $\beta_3$  度量了撤县设区的实施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净效应, 是本文的主要观察系数。

需要注意的是, DID 方法要求政策的实行在样本中是完全随机的以及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要满足共同趋势。而撤县设区在各地级市间的实施可能并不满足 DID 方法所要求的假设条件, 使用 DID 方法验证撤县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解决该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方法 (Rosenbaum and Rubin, 1983), 即通过协变量在控制组中选取与实施撤县设区城市具有相似特征的未实施撤县设区政策的城市。本文在控制组中选取与处理组具有相似特征的地级市时, 使用核匹配的方法来确定权重。其计算步骤如下: (1) 运用 Logit 模型估算整个研究期间每个地级市实施撤县设区的倾向得分值; (2) 计算处理组中每个地级市的结果变量在撤县设区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 并计算与处理组中每个地级市匹配的控制组地级市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 (3) 将处理组中的地级市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公共服务水平变化减去匹配的控制组地级市的变化, 从而得到撤县设区政策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实际影响 (刘瑞明、赵仁杰, 2015)。

## (二) 变量描述

本文研究的重点为撤县设区政策改革的实施是否提高了某一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 由于考虑到其他经济因素也会对城市公共服务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本文还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 具体如表 1 所示。

###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考虑到实际中教育和医疗是最主要

和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选择基础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来反映公共服务水平。本文借鉴夏怡然和陆铭（2015）的做法，用生均小学教师数和生均中学教师数来衡量城市的基础教育水平，用人均医院数、人均病床数和人均医生数来衡量城市的医疗服务水平。鉴于上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提取其第一主成分得分值作为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的指代变量。<sup>①</sup>

##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是否实施了撤县设区行政区划调整，为二值虚拟变量。由于不同城市实施撤并政策的时间顺序不同，因此本文借鉴唐为和王媛（2015）的做法，将2000—2004年实施撤县设区的地级市划分为处理组，而将在研究时段（1995—2012年）没有实施撤县设区的地级市视为控制组。对于实验期变量 $t$ 而言，将城市 $i$ 实施撤县设区以前年度设为“0”，将城市 $i$ 实施撤县设区当年及其后的年份设为“1”。

## 3. 控制变量

为了准确分析撤县设区对公共服务水平所形成的净影响，减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同时选取了一系列影响公共服务水平的控制变量。根据经典的单中心城市理论，人均收入（ $pergdp$ ）的增加会对公共服务产生影响，鉴于经济要素的聚集通常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呈现阶段性趋势（刘修岩，2014），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加入人均收入的二次项（ $pergdpsq$ ）来考察人均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之间是否存在“U”型数量关系（秦蒙等，2016）。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会影响政府收入，进而对公共服务投入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借鉴李斌等（2018）的做法，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ind2$ 和 $ind3$ ）和工业增加值（ $indus$ ）作为产业结构发展的代理变量，刻画其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 $fdi$ ）构成了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刘瑞明、赵仁杰，2015），也会对公共服务水平产生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始数据为美元，本文根据当年汇率将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折算为人民币。

表1 主要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i>education</i>	基础教育	生均小学教师数和生均中学教师数的主成分得分值
<i>medical</i>	医疗服务	人均病床数、人均医院数和人均医生数的主成分得分值
<i>Merger</i>	是否实施撤县设区	实验组虚拟变量(0,1)
<i>t</i>	实施撤县设区的时间	实验期虚拟变量(0,1)

<sup>①</sup> 基础教育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75.4%，医疗服务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63.8%。由于一些城市的主成分得分值出现负值，不利于经济上的解释，因此本文对所有城市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的得分值都加3，此举并不影响文章的实际结果。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i>pergdp</i>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亿元)
<i>ind2</i>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i>ind3</i>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i>industry</i>	产业结构	工业增加值(亿元)
<i>fdi</i>	外商直接投资	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 GDP 的比值(%)

### (三) 数据来源

实施撤县设区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行政区划网站 (<http://www.xzqh.org>), 此网站记录了历年县级以上城市实行政区划调整的详细信息。本文主要研究2000—2004年发生的撤县设区调整, 这一时期共发生42次撤县设区, 是1995—2012年行政区划调整较为密集的时段。

本文所用数据样本为中国地级市1995—2012年的面板数据。<sup>①</sup>之所以选取1995年为起点, 主要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分税制改革。本文对原始数据做如下处理: 以1995年中国存在的地级市为基准, 删除1995—1999年和2005—2012年发生撤县设区的地级市(包括武汉、泸州、北京、重庆、上海、厦门、西安、白山、哈尔滨、南通、徐州、宜宾、长沙、昆明、扬州、苏州、雅安、青岛、清远、揭阳、泰州); 另外, 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严重缺失, 故本文也删除西藏的地级市, 最终得到的样本数量为3546个。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为市辖区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ducation</i>	3537	3	0.8396	0.2911	29.7472
<i>medical</i>	3528	3	0.8480	1.9807	30.5402
<i>Merger</i>	3546	0.1470	0.3541	0	1
<i>pergdp</i>	3546	2.6631	2.4311	0.0001	29.3346
<i>pergdpsq</i>	3546	13.0004	33.2159	1.00e-08	860.5188
<i>ind2</i>	3546	49.8224	14.3918	1	85.73
<i>ind3</i>	3546	44.4712	13.3835	1	86.63
<i>industry</i>	3546	649.8799	158.0153	0	7142.944
<i>fdi</i>	3546	51.2874	183.8039	0	9303

① 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倾向得分检验

本文首先基于撤县设区政策实施前 1995—1999 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上述变量对城市实施撤县设区的概率进行了 Logit 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工业增加值等协变量的大小，都对地级市是否实施撤县设区具有显著影响，表明本文所选择的协变量具有合理性。

表 3 协变量对实施撤县设区的影响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值
<i>pergdp</i>	0.2192	0.3439	6.3700	0.0000
<i>pergdpsq</i>	-0.2854	0.0637	-4.4800	0.0000
<i>ind2</i>	-0.0049	0.0089	-0.5500	0.5800
<i>ind3</i>	0.0174	0.0102	1.7100	0.0870
<i>industry</i>	0.0014	0.0004	3.3900	0.0010
<i>fdi</i>	-0.0100	0.1259	-0.0800	0.9360
<i>_cons</i>	-4.7812	0.6940	-6.8900	0.0000
Pseudo R <sup>2</sup>	0.1875		样本量	98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4 软件估计得到。

### （二）样本匹配质量检验

#### 1. 平衡性检验

本文根据样本在匹配前后的均值差异 t 检验和标准化偏差，对单个协变量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同时，还根据匹配后样本模型的 R<sup>2</sup> 和 LR 检验，对样本整体的平衡性进行了检验（万海远、李实，2013；贾俊雪、宁静，2015；赵勇等，2017）。从表 4 可以看出，在进行核匹配后，两组样本间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小于 5%，t 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样本在匹配后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表明模型中单个协变量满足样本匹配平衡性条件；同时，由样本匹配后较小的倾向得分模型 R<sup>2</sup> 和 p 值可知，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本文的协变量满足整体平衡性条件。

表 4 以城市公共服务为结果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协变量	匹配后的控制组 协变量均值	匹配后的处理组 协变量均值	偏差 (%)	t 值	p 值
<i>pergdp</i>	1.8002	1.8260	-2.7000	-0.2000	0.8420
<i>pergdpsq</i>	4.2622	4.5570	-4.5000	-0.4300	0.6690

续表

协变量	匹配后的控制组 协变量均值	匹配后的处理组 协变量均值	偏差(%)	t 值	p 值
<i>ind2</i>	49.0120	48.8300	1.3000	0.1200	0.9030
<i>ind3</i>	40.3810	39.9750	1.7000	0.3200	0.7500
<i>industry</i>	289.2300	286.6000	0.8000	0.0700	0.9450
<i>fdi</i>	0.01176	0.0084	0.0000	0.8900	0.5760
Pseudo R <sup>2</sup>	0.0040	LR chi2	1.3900	p > chi2	0.9660

## 2. 共同支撑检验

在估计实施撤县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之前，还需要进行共同支撑检验。由于倾向得分匹配法是通过剔除不在共同支撑区域内的样本量来提高匹配质量的，如果剔除的样本量过多，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将具有片面性。本文在进行核匹配时，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量落在共同支撑区域外的数量分别为6个和21个（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总样本量分别为142个和838个）。因此，本文剔除的样本数量较少，其平均处理效应的准确性具有很大程度的代表性。

### （三）平均处理效应

基于1995—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本文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价撤县设区政策的实施是否提高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结果表明，实施撤县设区有利于提升城市基础教育水平，但对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明显（见表5）。

表5 撤县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PSM-DID检验结果

	撤县设区 前控制组	撤县设区 前处理组	撤县设区 前控制组与 处理组的差分	撤县设区 后控制组	撤县设区 后处理组	撤县设区 后控制组与 处理组的差分	双重差分检验 结果即平均 处理效应
<i>education</i>	3.0750	2.8460	-0.2280	3.0480	2.9170	-0.1320	0.0960
标准误			0.0460			0.0290	0.0550
t 值			-4.9300			4.5400	1.7600
p 值			0.0000 ***			0.0000 ***	0.0790 *
R <sup>2</sup>							0.01
<i>medical</i>	2.4740	2.4400	-0.0330	3.2000	3.2820	0.0820	0.1150
标准误			0.0710			0.0440	0.0840
t 值			-0.4700			1.8500	0.5800
p 值			0.6400			0.0650 *	0.5640
R <sup>2</sup>							0.09

注：① \*\*\* 和 \* 分别表示变量在1%和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②基础教育参与匹配的样本为3407个，其中处理组样本为484个，控制组样本为2923个；医疗服务参与匹配的样本为3399个，其中处理组样本为500个，控制组样本为2899个。



得到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实施撤县设区后，居住格局决定了教育需求的空间分布并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教育投入和师资配比等需要按照区的标准，从而有利于提高教育服务水平；从医疗服务的需求和供给来看，中国优质的医疗机构更多的是集中于中心城区，且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患者通常倾向于去中心城区的大医院接受诊疗服务，对原属于县城的医疗机构的需求并不强烈，同时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偏向”制度背景下没有动力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因此导致撤县设区对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综上所述，实施撤县设区有利于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深层原因可能在于，一是撤县设区的实施化解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经济和土地资源的市场分割问题，减少了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行政摩擦，促进了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从而带动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二是实施撤县设区后，原先的县级行政层级变更为市级，不仅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也加快了社会资本的流入速度，有助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地方政府相较以往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利与财政资源支配自主权，从而开始更多地专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行政区划调整是地方政府降低城市行政成本、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常见做法，但此举是否有效，则有待进一步验证。本文基于2000—2004年各地区实施的撤县设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撤县设区是否提高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结果表明，撤县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方面，对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作用不明显。

在既定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下，为更好地发挥行政区划调整在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因地制宜、稳妥地开展撤县设区。以人民为中心，更多地以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为导向来进行行政区划调整，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带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投入管理体制与机制的转变，确保公共服务长效机制的建立。二是以行政区划调整带动公共服务布局调整和投向结构调整，特别是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调整，来发挥城市对乡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三是需结合医疗服务供求现实特点以及人口流动和分布趋势，在撤县设区过程中建立医疗机构设施布局和医疗服务供给结构的动态调整机制。

### 参考文献

陈淑云、曾龙(2016):《土地财政依赖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基于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42~53页。

何韵文、郭符林(2017):《浅析撤县设区与地方教育支出增长——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当代经济》第22期,第122~126页。

贾俊雪、宁静(2015):《治理结构与地方政府职能优化——基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拟自然实验分析》,《管理世界》第1期,第7~17页。

刘佳、吴建南、吴佳顺(2012):《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基于河北省136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第35~45页。

刘叔申、吕凯波(2012):《“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升效应——基于江苏省2004~200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财政金融研究》第4期,第67~71页。

柳拯、汤恒、吴国生等(2017):《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实施效果——对重庆市撤县改区的调研报告》,《理论视野》第7期,第74~78页。

卢盛峰、陈思霞(2016):《政策偏袒的经济收益: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的证据》,《金融研究》第7期,第33~46页。

刘修岩(2014):《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对中国省级层面集聚效应的检验》,《世界经济》第1期,第55~80页。

刘瑞明、赵仁杰(2015):《西部大开发:增长驱动还是政策陷阱——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第32~43页。

李斌、金秋宇、卢娟(2018):《土地财政、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的影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4期,第69~78页。

宁静、赵国钦、贺俊程(2015):《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能否改善民生性公共服务》,《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5期,第77~87页。

秦蒙、刘修岩、李松林(2016):《中国的“城市蔓延之谜”——来自政府行为视角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学动态》第7期,第21~33页。

谭之博、周黎安、赵岳(2015):《省管县改革、财政分权与民生——基于“倍差法”的估计》,《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1093~1114页。

汤玉刚、陈强、满利苹(2015):《资本化、财政激励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218~240页。

唐为、王媛(2015):《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9期,第72~85页。

魏后凯(2014):《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18~30页。

王德祥、李建军(2008):《人口规模、省直管县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来自湖北省市县两级数据的经验证据》,《统计研究》第12期,第15~21页。

万海远、李实(2013):《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研究》第9期,第43~55页。

夏怡然、陆铭(2015):《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第78~90页。

叶林、杨宇泽(2017):《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三重逻辑:一个研究述评》,《公共行政评论》第4期,第158~196页。

赵聚军(2012):《公共服务:行政区划调整中应予关注的一个基本变量》,《中共天津市委党

校学报》第3期，第54~60页。

赵勇、刘金凤、张倩（2017）：《东北振兴战略是否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城市与环境管理》第4期，第27~46页。

赵勇、魏后凯（2015）：《政府干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兼论中国区域政策的有效性》，《管理世界》第8期，第14~29页。

Henderson, J. V., J. R. Logan and S. Choi (2005), "Growth of China's Medium-Size City [with Comments]",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6), pp. 263 - 303.

Rosenbaum, P. R. and D. B. Rubin (1983),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Biometrika*, 70 (1), pp. 41 - 55.

Wang, W., X. Zheng and Z. Zhao (2011), "Fiscal Reform and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42 (2), pp. 334 - 356.

## Does the City-county Merger Improve Urban Public Services?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PSM-DID Method

LIANG Zhi-yan<sup>1</sup>, ZHAO Yong<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Institute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adjustment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tools for local government to reduce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promote urbanization. However, it needs to be tested empirically to see if this has improved urban public service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the city-county merger policy from 2000 to 2004.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ty-county merger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urban education, but its impact on medical services is not clear.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urban public services, straighten out the urban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nd ens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financial input mechanism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city-county merger; public service; PSM-DID

责任编辑：庄 立